

论马丁·怀特的国际革命思想

张 菲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马丁·怀特认为国际政治不单是权力政治, 它还包括由信仰和学说引发的国际革命, 国际社会的生活由革命时期和非革命时期组成, 几乎各占一半。国际革命对国际社会、对战争与和平、对外交关系产生了重大而又复杂的影响。由此, 马丁·怀特对以权力政治为国际政治的常态而以国际革命为不正常或异类的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马丁·怀特指出对于国际革命的忽视和误解, 表明国际政治的研究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错误的导向和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对人类的信仰和动机的无知。

[关键词] 国际革命; 国际社会; 权力政治; 马丁·怀特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8)01-0020-05

马丁·怀特是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他高度重视文化价值取向、思想信仰和历史经验在国际政治运行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怀特早年因为出版了展示现实主义理论著作《权力政治》而享誉学术界, 但是对于以实力为核心的权力政治的重视, 并没有妨碍他认识到以信仰为核心的国际革命的重要性, 这是他全面地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的基础。

马丁·怀特认为虽然信仰在国际政治中并不占优势, 但是同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仰(例如: 基督教、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观念是国家和国际力量的重要吸引力和源泉; 反之, 权力又促使信仰和观念的消涨,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际政治不单只是权力政治, 它还包括由信仰和学说引发的国际革命, 国际社会的生活由革命时期和非革命时期组成, 两者几乎平分秋色。国际革命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对人类的信仰和动机的无

知, 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错误, 那就是对因狂热信仰和激情引发的国际革命的误解和忽视。由此, 马丁·怀特对传统的以权力政治为国际政治的常态, 而以国际革命为不正常或异类的国际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

一、马丁·怀特关于国际革命的界定

要理解国际革命, 就首先要界定何谓革命。对于“革命”一词,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和界定。从词源学上来说, 革命的原意是指一种回复至原点的循环运动, 后来引申成为“转动”, 再后来变成了“翻转”。《牛津英语词典》上把革命解释为受制于某政府的人推翻其政府。马克思认为, 一般意义上革命就是“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1](P5)}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以后,

革命就“越来越意味着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或是人民进步力量以最低限度的暴力推翻反动政府了。”^{[2] (P.207)}彼得·卡尔弗特认为，所有革命模型都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革命是突发的；第二，革命是暴力性质的，所有政治系统最终都依赖武力的运用（学术上称为“物质强迫”）；第三，革命是政治演替；第四，革命是变革。^{[3] (P.19)}卡尔弗特认为理解革命要通过“日复一日的世界的权力政治和联合的建立，革命就是暴力政治”。^{[4] (P.159)}弗·哈迪利则认为无论其国内缘由是什么，“所有革命都产生一种意识形态，除号召社会内部的转变外，它还声称自己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相关性，声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国际的’或‘全球的’”。^{[5] (P.56)}

马丁·怀特在论述国际革命之前，是这样界定革命的。他认为“通常革命是指用暴力方式变更一个国家的政权”。^{[6] (P.81)}但是，他强调，“我们必须记住，诸如此类的革命都有其国际性的一面”。^{[6] (P.81)}他认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爆发的荷兰叛乱、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等，都有国际性的背景，也都产生了超越国界的影响。正如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7] (P.58)}马丁·怀特也认为必须重视革命的国际背景和国际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就是国际革命。马丁·怀特是从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国际关系的视野来考察爆发于某一国家的革命，因而发掘了革命在国际层面上的影响和意义。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不是以权力政治为线索，从中寻找支配性大国的发展轨迹或者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而是以那种狂热信仰的反复爆发为线索，发现了类似的思想信仰冲突和激情对国际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马丁·怀特的研究结论是：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突出的国际革命主义浪潮，即16~17世纪的宗教革命、法国大革命尤其是雅各宾派的革命和20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这三次革命浪潮不仅使一国内部而且使整个国际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巨变。^{[8] (P.8)}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宗教革命，使西班牙、奥地利、德意志诸侯国、荷兰、英国、瑞典、罗马教廷等都

深深卷入其中，直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和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欧洲的国际政治才不再受宗教激情的影响。然而，法国革命的爆发又重新将狂热的信仰和激情引入国际关系。“革命者按照自己无国界限制的理想重新塑造法国，并欲将这种理想传遍整个欧洲。”^{[9] (P.48)}马丁·怀特认为《凡尔赛和约》的签署标志着法国革命对神圣同盟取得了最后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以俄国革命为首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则彻底冲击了国际规则和国际社会的基础。俄国革命“最深刻的意义不在于它为俄国和其他地方带来的变化，而在于其成功地否定了国际关系的法治。”^{[9] (P.49)}苏联以第三国际这样一个国际革命组织破坏了国际社会旧有的法律、习俗和规则。一战之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使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宗教战争颇为相似。民主国家、法西斯国家和共产党国家形成了三角冲突。

由此可见，马丁·怀特超越了传统的权力政治的视角，从信仰理念的角度考察国际关系史，从而发掘了国际革命就是由信仰理念和狂热激情引领下、反复爆发的、对国际关系面貌和国际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革命运动。

二、国际革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

国际革命对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恩格斯在1854年1月8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文关于欧洲战争中革命所展示的巨大国际作用时说道：“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他还说：“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创造万物、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10] (P.8)}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都一再说明了狂热信念和激情所引领下的国际革命可以超越和打乱权力政治的运作规律。

马丁·怀特抛开从国家力量对比探索国际政治变化的现实主义传统视角,他试图从狂热信仰的反复爆发来解释国际革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首先,马丁·怀特认为国际革命对国际社会的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原本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无政府但有秩序的松散的联合体。但是国际革命时期的国际社会“似乎更像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而不是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个体对国际社会的忠诚胜过对国家的效忠。”^{[9] (P.50)}然而,这个“统一的有机体”仅仅是表面现象,因为国际社会已经因为国内战争和国际混战四分五裂;加之,革命国家总是试图利用信仰来进行超国家的效忠分野,反而加重了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在革命主义思想家看来,国内与国外并无真正区别,不存在有真正的独特主体、独特性质的国际关系。”^{[11] (P.48)}因此他们对“利益”进行了重新解释,那就是超国家的利益和人类共同体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革命削弱了“国家主权学说”,对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社会而言,是一种解构。国际革命使整个国际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从而可能导致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革命的目的就是颠覆以往的旧秩序和规则,以新的原则重组国际社会。马丁·怀特认为这种反复爆发的以武力、战争来改变国际社会的有组织的国际革命浪潮,与大多数学者所分析的国际社会情况大相径庭。

其次,马丁·怀特认为国际革命改变了权力政治色彩浓厚的国际政治,对革命信仰的激情与狂热,减轻了政治实用性和利益考虑,模糊了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界限,从而改变了外交。国际关系通常是政府代表本国人民,通过外交谈判和让步,来协调各国的利益冲突。但是革命主义者往往倾向于扫除传统的外交体系和规则,以表达自己的信念。比如,托洛茨基被选作代表革命面对欧洲的人选而担当首任苏维埃对外关系使节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计划:“我将对世界民族发表几个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打烊。”^{[8] (P.154)}类似的表达和思想也曾出现在法国革命中。外交是试图通过谈判和妥协,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而革命则强调通过信仰与宣传,影响和

改变支持这些利益的舆论,最后使外交谈判变成坚持己方立场的论坛,从而使国家利益的冲突被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所掩盖。革命的国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不能代表本国人民,那么它就有可能越过政府间关系,利用信仰直接操纵其他国家的民众,由此激怒别国政府,引发国际冲突与战争。

再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国际革命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它使战争与和平、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战争与革命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9] (P.52)}怀特对战争有新的理解,他认为战争不在于是否存在实际交火,而在于自始至终存在着人人皆知的倾向,即无法确保和平,也可以称之为“不战不和”的冷战。这是因为革命国家在道义上和心理上始终与其他国家处于战争状态,“革命国家认为它的使命就是通过胁迫、转化对手来改造国际社会。”^{[9] (P.52)}而其他国家也通常视革命国家为国际社会的挑战者和反叛者。国际革命带有狂热的思想信仰色彩,而且革命目标是无止境的,所以经常引发革命战争,这些战争又通常导致战败国一方的国内革命。与此同时,由于信仰的冲突无处不在,国际革命使许多国家内部因为信仰的不同而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这种分裂可能引发内战。

最后,怀特认为,掩盖在狂热信仰和国际战争帷幕之下的国际革命主要的作用是为大国的帝国主义提供新动力。比如,宗教改革在相继满足了德意志诸侯国和瑞典的领土野心、迎合了荷兰和英国的商业利益之后,最终的代表却是愤世嫉俗的腓特烈大帝;法国革命的全球理想主义很快蜕变为拿破仑帝国主义;纳粹运动中的革命因素也是与德国帝国主义扩张企图密不可分的;共产国际几乎变为苏联外交部的附属机构,而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已经变为苏联帝国主义了。

三、马 丁·怀特国际革命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马丁·怀特对国际革命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与

分析,第一,消除了这样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区——即国际政治的图景是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不单只是权力政治,它还包括由信仰和学说引发的国际革命,国际社会的生活由革命时期和非革命时期组成,几乎各占一半。怀特将国际革命和非革命时期的国际关系历史做了对比:如果把1492~1517年、1648~1792年、1817~1914年看作非革命阶段,而将1517~1648年、1792~1871年、1914~1960年看作革命阶段,则有256年国际革命时期和212年非革命时期。如果认为直至1559年后宗教才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主要要素,那么革命时期和非革命时期的总年限几乎恰好颠倒过来。^{[6] (P.92)}可见,非革命的国际政治与革命的国际政治在国际社会的历史中所占时期几乎平分秋色。由此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将非革命的国际政治视为更正常的现象,而把革命的国际政治视为不正常或者变态呢?马丁·怀特批驳了占主导地位的认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的思想。他抓住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这三次国际革命的典型,以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纵横捭阖,对史实进行梳理和归纳,并且升华为理论化的哲理思考,对传统的以权力政治为常态,以国际革命为不正常或异类的国际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

第二,马丁·怀特批评了国际政治研究中对人类信仰和动机的无知,以及国际政治“理应如此”的错误信念。虽然国际革命最终会转变为现实利益的考虑,但是这并不否定革命信仰的真实性和国际革命的反复爆发性。“以为革命学说已遭抛弃,或者认为革命学说仅仅是被虚伪地以国家利益为由而继续保留的观点,都错误的。”^{[9] (P.55)}这是因为曾经震撼世界的那些信仰,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它们的力量恰恰就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理性既不能创造信仰,也不可能改造信仰。”^{[12] (P.65)}只要人类面临不平等和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就有可能以激进的方式进行抵抗,因而革命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马丁·怀特认为追求思想信仰与政治一致的“国际革命”与追求国家自由和平衡的多样性的“权力政治”在国际社会的历史中几乎平分秋色,所以,无论将两者中的哪一个视为正常现象,“都表达了一种

国际政治理应如此的信念”。^{[9] (P.55)}这种“唯一正确、唯一代表”的思想只不过是学者或观察家自己对国际社会面貌的倾向罢了。他认为由于对人类信仰和动机的无知,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错误的导向和严重的错误。怀特通过对国际革命的探究,揭示了战争、和平、外交、均势、大国等等不过是国际政治浮光掠影的表象,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人类信仰、心理和动机的复杂多变与难以捉摸。

第三,马丁·怀特观察到国际革命与非革命时期虽然各占一半,但由信仰激发的国际革命最终要让位于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政治。他强调除实力、权力以外,思想信仰和观念学说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影响,这对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流派的理论构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怀特提请人们注意,“国际革命从来没有长期为革命而反对国家利益,思想信仰方面的考虑不出两代人的时间总是要让位于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考虑。”^{[9] (P.54)}这样的历史事实枚不胜数,例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在西方的均势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天主教的法国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革命之子拿破仑与哈布斯堡王朝之女联姻,……尤其是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为维护眼前的国家利益而彻底撕碎了一再鼓吹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最为惊人的事例。

第四,马丁·怀特对国际革命的考察,揭示了仅从技术性细节考虑并不能准确、全面理解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马丁·怀特对国际革命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他能够超越“权力政治”而看到“国际革命”,透过国际革命认识到人类信仰和动机对于国际政治的深刻和复杂影响,这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由此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何当时处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镇与前沿的美国的诸多学者却未有这样的学术发现呢?答案一方面可能是反共的意识形态偏见束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科学行为主义”方法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非常盛行,似乎只有这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取得对国际政治科学的准确的理解。然

而,科学行为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观察和研究是肢解的、支离破碎的,当然难以产生宏观的、深刻的、有历史魄力的重大发现。与“科学”方法在美国盛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哲理思考一直在英国占主流地位。马丁·怀特尤其以历史哲理的研究方法见长。怀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对国际关系的政治哲理化思考,历史—哲理的传统研究方法仍然不可被取代。因为,构成国际社会的国家体系是由共同的文化传统维系的,在这个体系中,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利益、价值观念和历史经历的互动。这也是怀特一再强调的国际政治恒久的根本特点。对于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只有与历史同行,才能磨练出宏观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

第五,马丁·怀特对国际革命的研究揭示了国际政治复杂多变的图景和人类信仰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作用,这一思想见地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撼和

钦佩。然而,早期的经典性著作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已经通过弥罗斯人与雅典人的精彩对话,揭示了权力政治不能囊括这个世界的全部,人类的信仰和理念也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影响。怀特的重大学术发现是对其他学者熟视无睹的新发展了的国际政治的更为全面、客观、宏大的解释,问题的根本性质并未改变。这一事实对比再一次验证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对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和学术成长所下的经典断语: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参考文献]

- [1] 薛汉伟,辛仲勤,潘国华. 革命与不断革命研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 [2]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 自由主义的终结[M]. 郝名玮.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 [英]彼得·卡尔弗特. 革命与反革命[M]. 张长东等.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4] Peter Calvert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London New York: Pinter 1996
- [5] [英]弗·哈迪利. 革命与世界政治[M]. 张帆.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 [6] Martin W. Eht Power Politics[M].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 [7] [法]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8] Martin W. E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ree Traditions[M].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 [9] [英]马丁·怀特. 权力政治[M]. 宋爱群.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 [10] [德]恩格斯. 欧洲战争[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11] 时殷弘. 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 [12] [法]古斯塔夫·勒旁. 革命心理学[M]. 佟德志,刘训练.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齐琳)